第35卷 第12期 北部湾大学学报 2020年12月
Vol.35 No.12 JOURNAL OF BEIBU GULF UNIVERSITY Dec.,2020

DOI: 10.19703/j.bbgu.2096-7276.2020.12.0076

黄宗智与《近代中国》的中国研究

唐嘉蔓，李　松

(武汉大学 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美国的《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是区域研究的重要刊物，其创办至今始终随着国际学术潮流而与时俱进，40多年来在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著名华裔学者黄宗智是《近代中国》的创刊编辑以及核心创办者，他的编撰方针、学术理念及其个人化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论在该刊的主题与内容上具有鲜明的体现，并影响着期刊主题的流变。在对旧的中国研究的反思中，黄宗智摒弃旧有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理论框架，立足中国的实践并追求二元联系与二元结合的新观点，为未来中国研究指出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 黄宗智;《近代中国》;中国研究;范式;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276(2020)12-0076-08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为适应各个学术领域的政治和经济的现实需要，在研究人员、学院建制以及学术平台等方面蓬勃发展，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运用社会科学主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领域进行综合研究[1]。在区域研究的学术建制中，学术期刊的创建是学科发展渐趋成熟的标志，《近代中国》(Modern China，1975)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英语世界具有学术风向标意义的权威刊物。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Philip C.C.Huang，1940—)是《近代中国》的创办者，他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后来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的创办主任(1986—1995)，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直至2004年光荣退休，2012年始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

因研究历史与社会科学而闻名的国际性杂志《近代中国》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在区域研究期刊中发挥了领头雁的作用。从1975年创刊至今，该刊已经出版40多卷，刊载了约800篇文章。在这40多年里，《近代中国》一直是研究19世纪晚期中国、20世纪中国以及现代中国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通常基于新的研究，或专门针对新解释、新问题和对旧问题的新答案的研究而提供学术思想。《近代中国》鼓励跨越陈旧的“前现代/现代”以及“现代/当代”的界限来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内容涉

[收稿日期] 2020-11-04

[基金项目] “武汉大学通识3.0”文化研究导论项目;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团队发展计划:近现代东亚的作家流徙、文学越境与文化触变研究(1102-413100047);武汉大学中外联合科研平台种子基金支持计划:武大—杜克中西文论的对话互鉴研究联合科研平台(KYPT-PY-1)

[作者简介] 唐嘉蔓(1996—)，女，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李　松(1974—)，男，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海外中国学与文学理论研究。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及社会科学、历史学、法学、文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刊发的论文来自英语国家、欧洲国家、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中国学研究者，其编委包括美、澳、日、德、中、英以及加拿大等国家的学者，刊物品牌在西方学界具有良好的口碑[2]。黄宗智担任《近代中国》的创刊编辑至今，对于该刊物的影响有迹可循，他在此刊上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主导并组织展开过多次影响很大的学术讨论，讨论的成果后来刊登于该杂志，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学术热潮。虽然《近代中国》发表的论文涉及较多领域，但最主要的还是社会学和历史学，而这也是黄宗智的主要研究领域。该刊在论文的选取以及问题的探讨上常常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理念和思想，在理念和内容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变化，而这又与黄宗智的研究方向和理念的转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探究黄宗智的个人学术研究与《近代中国》的发展及其转变，小而言之，有助于发现这一刊物发展流变的脉络，进一步探索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大而言之，可以发掘黄宗智个人对该刊物的影响与贡献，并从整体上了解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整体转型与发展。总之，本论文围绕学者、刊物、学科三者的学术关系，展现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的思想与方法。

据笔者对中外文献的查阅，目前国内学界尚无关于《近代中国》专门研究的论文或专著。据中国知网刊载，国内学者关于黄宗智学术思想研究的论文多达 160 余篇，探讨其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观点，对其思想进行质疑、解读与对话，由此可见黄宗智本人的学术思想在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影响。黄宗智虽然主要用英语写作，但很多个人论著也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因此本文基于其中的英文论著，结合《近代中国》的主要论文，从办刊理念、研究范式以及方法论革新三方面来分析黄宗智与《近代中国》的中国研究的内在联系。

一、《近代中国》的办刊理念

作为冷战后在美国兴起的区域研究的产物，《近代中国》自 1975 年创刊开始，就不断刊载关于中国研究各个领域、学科的研究成果，其办刊理念和内容伴随西方学界的关注重心以及中国现实社会的变化而始终处于流变之中。

《近代中国》自创刊肇始，创办者具有明确的办刊理念，即为中国学研究提供一个论坛与平台来审视过去的成果，并提出新的问题、拓展新的领域。《近代中国》的编委在第二期明确指出该刊的书写政策(stylistic policies) 有三个背离传统的做法："《近代中国》的书写政策在三个方面背离传统的做法：一是期刊的样式要求使用拼音系统来音译中文术语和专有名称，但知名人士和普通地名除外；二是要求投稿人不要使用以男性为导向的语言，即用男性词语来指代性别模糊的人群；三是本刊用 China 指'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避免使用'红色中国'或'共产主义中国'或'中国大陆'等词语；当有具体指称对象的时候避免使用'the Reds''the Communists''the Chinese'等模糊的术语。'Communists'一词仅适用于党员。"[3] 通过这一书写政策的说明，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从一开始就对传统的带有意识形态对立的西方中国学研究进行了区分，避免使用具有意识形态敏感性甚至带有偏见的批判表述来审视中国，从客观、中立的立场奠定了《近代中国》办刊理念的基础，因此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历史与政治的成见，从新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问题。《近代中国》1976 年第二期在 1911 年辛亥革命所展开的专题讨论会的序言部分，黄宗智提出："《近代中国》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提供一个论坛，以对我们的领域进行重要的重新评估，以敦促我们的专业人士总结所做的事情，重新审视过去的假设，并提出新的问题。"[4] 可见，其办刊理念是不断反思旧的中国研究，并不断推陈出新，从而提出新的问题。这一理念在刊载的论文选题以及问题讨论上都有体现。比如，在 1976 年第四期主要就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讨论，在编者按部分，黄宗智提出："我们希望这次交流和随后进行的其他交流将有助于我们的专业人士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希望这次座谈会能够在没有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的阴谋论和严格的反共主义的重负下进行。"[5] 主编力图以期刊为中心尽可能排除学术研究之外的政治干预，保持一个相对客观、中立、科学的学术氛围，确立严肃、纯粹的学术准则。

在《近代中国》办刊初期，以黄宗智为首的编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委成员，力图克服过去中国研究中所带有的偏见与偏执，曾多次研讨新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并反复强调需要克服过去中国学研究的观念成见，从而使该刊物的视野走向更为开阔的思想空间。不仅能在新的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以及文化潮流中通过反思过去的成果而发现新的问题，还引入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以外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力图将视野进一步扩大，发现新的学术生长点。1977年的“编者按”部分，黄宗智进一步提出：“从本期《近代中国》，我们希望在每期中都刊登一篇或多篇有关于中国或日本学术研究方面的文章。我们希望以哪怕微不足道的方式为克服过去我们领域的偏执主义做出贡献。就像这里的论文一样，这些论文应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激烈争论，并指出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研究中获得新知。同时，毫无疑问，我们还将了解他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西方学者在其中做出独特的贡献。我想借此机会邀请该领域的同事发表此类文章。”[6]之后，《近代中国》刊登了许多中日学术研究的讨论成果。该刊物一方面引导学者反思西方自身的研究，另一方面与其他学界进行交流，发现自身研究的独特性。《近代中国》作者主体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立场处于西方学界，他们以审视他者的眼光来认识中国，以中国为对象和客体，自身占据主体地位并反思自身，通过一次次研讨来发掘过往在中国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对中国研究范式问题的研讨，对中国革命研究的讨论，对中国法律、历史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与中国学者展开关于国家本质的对话。同时，《近代中国》也在自身的立场上将眼界不断拓宽，力求克服过去西方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偏见，寻求一种更适应当下、更贴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又表达西方理论的研究方法。

总之，虽然《近代中国》历经不同时段、不同语境，其办刊理念随着研究的问题在发生转变，但其所固守的理念是对西方中国学研究的反思以及应对新时代关于中国新问题的发现。从期刊的序言部分可以看到黄宗智代表《近代中国》阐述刊物发展的基本理念，因此他的学术思想与《近代中国》办刊理念的发展流变基本上是同步合调的。

二、《近代中国》与中国范式问题的反思

《近代中国》严格遵循办刊理念刊载论文。在上文已经提到，黄宗智本人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近代中国》刊载这两个领域的文章也最多，可见黄宗智个人的研究方向与刊物具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内容选择上对这些学科和领域更为重视。当然，随着办刊理念的转变，针对新时代新形势的变化，学界所研究和讨论的内容实际上也在与时俱进，从而展现了许多新的观点、方法和思想。

纵观《近代中国》所刊载的论文及其研究主题，可以发现关于中国研究的内容在不断更新和拓展。创刊早期很多论文，尤其在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讨论中，集中探讨中国早期革命以及政党等内容，可见当时西方学者的研究基于国际社会的研究热潮，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形态的中国及其意识形态，这其实与当时国际冷战形势以及中国本身的制度有关。而这时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识也不够全面和深刻，大多着眼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主要就中国的政治形态以及发展路线、意识形态来进行研究和分析。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本身的转型发展，脱胎于单一的意识形态的研究逐渐变得丰富起来，新的研究更贴近时事新变。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关注的是中国当下社会的发展变迁而非停留在过去的历史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进，研究的领域逐渐拓展，曾经以革命和意识形态研究居多，后来更多涉及经济、法律、文学、文化等领域，并且随着新的社会现象和学者群体的出现，又为中国研究带来了新的内容和题材。譬如城市化和城乡间的移民问题就是新时代的研究产物。另外，对旧问题的讨论也迈入了新的阶段，产生了新的主题，譬如对农村妇女这一问题的研究等。

《近代中国》在刊载内容的选择上，既有对旧问题的反思，也有对新问题的思考，二者相辅相成。黄宗智本人在《近代中国》出版至今这几十年间，个人研究的领域也有所转变，从历史学、社会学领域拓展到了法学、农业和乡村领域，伴随其个人研究领域的变化，《近代中国》所刊载的相关内容也随之有所增添，中国学者在此刊物发表的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相关论文也有所增长。《近代中国》作为学术对话的平台,中西学界的交流在此汇聚,相比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他者叙述,该刊物的中国研究在选题、观念与方法上日益贴近中国语境本身。值得一提的是,黄宗智曾主导了多次针对不同研究问题的学术讨论,其成果大多发表在《近代中国》特刊。下面笔者重点介绍关于中国范式研究问题的讨论。

《近代中国》分五期分别就研究的问题和领域刊载了相应的论文,时间跨度从 1991 年到 1998 年①。《近代中国》作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学术期刊之一,其发展历程与北美中国学的发展潮流密切相关。1992 年 5 月 9 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了一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的座谈会,会后重要学者的论文大多刊登在《近代中国》,并且根据学科差异形成了关于这些问题的专门讨论。以黄宗智的《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社会和经济历史的悖论》开头,之后《近代中国》分别在 1993 年第一与第二期、1995 年第一期以及 1998 年第二期刊载了就不同领域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论文,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研究范式问题讨论的全部内容。20 世纪 90 年代的这些学术讨论实际上也是顺应当时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潮流,海外学界审视之前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探寻新的研究模式。

中国研究范式的讨论涉及多重领域。专题之一是"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社会经济史上的悖论"(1991.3)(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专题之二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与理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1993.1)[7](Symposium: Ideology and Theory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II)②。专题之三是"'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在中国"(1993.2)(Symposium: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III)③。专题之四是"中国革命再思考"(1995.1)(Symposium: Rethink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IV)④。专题之五是"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1998.2)(Symposiu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V)⑤。西方理论所建构的研究范式实际上不能完全适用于对中国的研究,因此,黄宗智提倡从中国本身出发,通过实践或者经验,使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在中国研究中具有主体性,基于中国本身的特点建构研究范式,而不是单纯采用西方理论视域的研究范式。

三、黄宗智对《近代中国》中国研究方法论的推进

《近代中国》不断审视过去的研究、提出新问题的办刊理念以及随之变化并体现出这一理念的内容选择,实际上是期刊本身对理论反思的反映。笔者在上述的讨论中已经提到黄宗智对于期刊理念和内容选择的重要影响,可见他个人对于中国

① 随着国内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作为其代表之一的《近代中国》以及其主编黄宗智的研究自然受到了国内学界的重视《近代中国》中关于中国研究范式问题的讨论也被国内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过来,于 2003 年出版。然而本次出版并未全部收录《近代中国》对中国研究范式问题讨论的论文,而是仅仅选取了其中的两个部分,国内学界对此次讨论的提及和关注也是宏观且有限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对此次讨论的所有论文进行分析并进一步细化研究,笔者认为是有必要的。

② 参见如下论文:PERRY LINK .Ideology and Theory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LIU KANG .Politics, Critical Paradigms: Ref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MICHAEL S. DUKE. Thoughts on Politics and Critical Paradigm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ZHANG Longxi . Out of the Cultural Ghetto: Theory, Poli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③ 参见如下论文:FREDERIC WAKEMAN, JR.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WILLIAM T. ROWE.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in Late Imperial China. MARY BACKUS RANKIN. 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RICHARD MADSEN.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HEATH B. CHAMBERLAIN.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PHILIP C. C. HUANG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④ 参见如下论文:PHILIP C. C. HUANG. Rethink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MARK SELDEN. Yan'an Communism Reconsidered. JOSEPH W.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EDWARD BERENSON .A Permanent Revolut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1789.PHILIP C. C. HUANG. R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al and Objective Realities from the Land Reform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⑤ 参见如下论文:PHILIP C. C. HUANG Introduction. PRASENJIT DUARA .Why Is History Antitheoretical? ALEXANDER WOODSIDE. Reconciling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y Worlds in an Era of Western Development Fatigue (A Comment) .JOSEPH W. ESHERICK. Cherishing Sources from Afar. FREDERIC WAKEMAN, JR.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PHILIP C. C. HUANG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our Traps and a Question.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研究理论的反思和发展。一方面体现在《近代中国》的内容上,另一方面又推动刊物的发展流变。他个人的学术旨趣与期刊理论上的反思与发展具有一致性。

(一) 对过去中国研究的理论反思

《近代中国》创刊初始,黄宗智就在"编辑按"中多次提到该刊的发展目的:反思过去的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并为这些内容建立一个交流和讨论的平台,其所选择刊载的文章也有很多是反思过去研究的成果。比如,1976年《近代中国》第三期所刊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在西方——一个批判性观点》[8]是文学领域的学者对西方过往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反思;还有评论文章,比如,1978年第二期所刊载的《历史、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西方近期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一些著作的评论》[9],是对西方的一些论著进行的反思和评论。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它们都对过去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进行评价和分析,指出其中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不时回顾西方的中国研究,分析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现状。黄宗智曾在《近代中国》上多次发表此类论文,如1979年第四期的《中国明清与近代史研究现状》[10]就是反思和分析西方在对中国的明清与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所组织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研究范式的讨论,从社会经济史[11]和近代文学[12]等多个角度反思存在于西方学界的关于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这不仅仅是黄宗智个人的反思,更多一流的学者也参与进来,所讨论的领域不断扩大,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其后,黄宗智以《近代中国》为阵地,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反思性的学术活动,重新思考和评论过去的研究。1995年该刊第一期专门针对中国革命重新思考,刊载了黄宗智对这一问题的介绍[13]。其后他主要的学术活动均是基于之前研究的反思从而向前推进。黄宗智进一步推进了自身研究领域理论的反思,在1998年第二期发表了《理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14],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理论进一步省思。后来,黄宗智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法律领域,又从新的角度来批判过去美国中国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近些年,他增进了与国内学者和学界的对话,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中国乡村领域,于2001年担任《中国乡村研究》的创刊主编,提出从实践而不是从纯粹的经验和理论来进行研究,他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超越左—右鸿沟:从实践史中寻求改革》[15]就体现了这一观点。

2012年,黄宗智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其学术身份越发具有中西融合的特色。2016年,黄宗智在《近代中国》发表的《我们的问题意识——美国中国研究的再思考》[16]一文,是他在之前各个研究领域的基础上系统性地对美国过去的中国研究进行的批判性分析。黄宗智个人在理论上的回顾与批判已经比较系统,其思想历程整体的审视与总结在《近代中国》发表的数篇论文上有着显著体现。黄宗智通过对美国战后三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的分析,提出美国的中国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它们体现的是一个特别顽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乃至于一直都特别突出要么是西方的优越性,而中国只不过是其对立的'他者',要么是像最近一代那样强调中国和西方是相等的、一样的,甚或更优越的——使用的其实仍然是原来西方的标准和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两种论点基本都来自西方的理论和问题意识,都严重违反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实际:不可避免的古今、中西混合。"[17]156他认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这源于西方的理论和问题意识,和中国的实际不符。他进一步提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受到美国自身的问题多于中国的实际问题的影响,被美国的政治—思想大环境,多于中国本身的问题所塑造。它们反映的其实更多是关于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而不是关于中国主题的本身。"[18]因此他所提炼出的美国中国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反映的是美国自身的理论和需求,与中国本身实际存在着差别。学者明确了过往中国研究上存在的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可以进一步探索未来中国研究的理论发展方向,然而光有理论的指导,缺乏实际操作的方法,还是会使美国乃至西方对中国的研究重复过去的问题和再次陷入困境之中。近年来,黄宗智就在积极地探索和实践进行中国研究的新方法。

(二) 基于中国实践出发的研究

由于美国学界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轻视经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验证据,以及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两种理论传统,因此,为了突破这两种理论传统的限制,黄宗智指出:“要同时摆脱新自由主义以及其与后现代主义轻视经验研究的弊端,一个可行方案是在实践历史中探寻可供今天之用的实用智慧。一方面可以摆脱只重话语、轻视实践/经验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倚赖已有的经验和实际基础来确定今天的改革路径,避免毫无实际根据的空谈。我对‘实践’的理解包含三种含义。首先是相对于理论的实践,主要指行动……再则是相对于制度和结构的实践,主要指实际运作的过程,乃是(我开设的课程所纳入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家布迪厄的基本观点……最后是诸如当事人必具‘甘结’要求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则明显只是一种形式化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才可以看到的知县们的司法‘实践逻辑’,这是布迪厄的概念……所以说,我提倡的实践历史研究,绝对不是纯回顾性的,而是具有一定前瞻性/价值观念的。”[19]72-73 根据黄宗智的观点,要解决美国学界中国研究的固有问题,首先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利用过往的经验来建设理论,而不是单纯地用理论指导经验。同时,他指出这种实践并非是完全依靠过往经验的,而是要具有前瞻性和一定价值,需要用一定的理念来对实践进行取舍。从近几年《近代中国》所刊载的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讨论的话题越来越体现中国特色和社会现实,并基于实践问题进行考察研究。

(三) 超越中西思想的二元对立

美国以往的中国研究,二元对立的框架始终存在于研究者的理念之内,而这种思维定式立足于西方和中国的对立。近年来,随着与国内学界交流的加深,黄宗智个人的理论背景其实已经越来越脱离二元对立的框架,从而追求一种超越对立的融合统一。他对中国现实关怀的心态由消极转为积极:“过去作为处于美国学术界比较边缘地位的‘中国研究’的一员,多年来习惯于一种对中国只带有消极关怀(想而不写)的心态;但是,回到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学者开课,并为国内读者写作,自然而然地从消极的关怀转向积极的参与。这样,更把主要理论传统所包含的前瞻性论说带到自己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中心地位。”[19]61 通过积极深入地研究中国现状,黄宗智发现当代中国的经验无法从中西非此即彼的单一元来理解,而需要从二者的结合和互动来理解。他立足于问题意识的角度,提出:“‘现代中国’实际上只可能是双重文化的,如今更不简单的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而是既是资本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的。要真正将西方去中心化、真正把中国中心化,我们的问题意识需要从中国的理论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的理论建构出发……西方 VS 中国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更被扩延到一系列其他的二元:如现代 VS 传统、工业 VS 农业、城市 VS 乡村、市场 VS 人口、市场 VS 国家、形式理性法律 VS 实体主义法律等。一贯的是,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中追求逻辑上的同一,非此即彼地在二元之中完全偏重单一元,常常无视经验证据和实用实际。”[17]175-176 黄宗智在自己过往的研究领域发现,中国研究存在的多种二元对立,过往研究中非此即彼地偏重单一元,往往使理论偏离实际,因此需要超越二元对立的框架,肯定二元的共存,在中国研究的问题上结合中西理论和实际。这一观点在《近代中国》2019 年刊载的《基于中国现实的社会科学探索》中有所体现。黄宗智在该文中对自己 50 多年来的学术研究予以回顾,重点围绕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如何对接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研究者在真正将中国现实与西方理论联系起来之前,必须掌握中国现实的矛盾本质,以中国现实为基础,建立一种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科学理论体系。他多年从事实证研究的经验,一再印证了西方理论与中国事实的脱节,而西方理论往往忽视二元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共存和互动。例如,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司法系统中,无论是立法者、基层司法的践行者还是涉讼的普通民众,他们都无意全盘坚守传统或全盘援用西方法律。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他们逐步开创出中国法律的“现代性”——一种既包含传统中国社会经济逻辑又包含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逻辑、既渗透传统中国道德与伦理关怀又掺入西方文化思想的混合体。其他列举的实例还包括专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以及论文《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黄宗智在上述研究范例的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基础上提出:“学术研究就是尝试最准确地捕捉到并理解真实世界,而不是阐述一种又一种的理论或思想体系,而当下西方理论家们的理论构想往往是对经验现实的片面简化、理想化,然后用逻辑推理去固化、绝对化,进而被政治势力和西方中心主义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因此,西方理论家们的理论构想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知识方法,而不是现实本身。研究者应该熟悉现有理论,优先通过实证研究筛选、修改理论框架和构想,重塑理论概念以阐明、解释经验世界。西方国家作为曾经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既是非西方世界所仇视憎恨的敌人,又是他们崇拜学习的典范,这两者相互交错、不可避免的共存状态,构成了非西方的现实世界。然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一般都忽视了非西方的这种双重特征,并且通过演绎逻辑或更简单粗暴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坚持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必定要遵循西方社会模式。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研究方法解释不了经验现实。西方理论家们应该将注意力转向二元对立如何在更大的现实世界中共存、互动和重塑彼此的问题上,以便寻求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的途径,更好地探索改善世界的方法。”[20-21]上述反省与总结是黄宗智毕生研究心得和探索经验的高度浓缩,体现了晚年黄宗智不断超越经历和时代局限、探索理论建树的求真务实的精神。

(四) 中国研究的新方向

黄宗智在对过去研究不断反思的基础上,对未来中国研究理论的发展也提出了很多观点。他的观点建立在中西方学界各自的理论传统之上,认为中国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而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则是新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这两种理论传统影响下的中国研究其实都具有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框架。“这两大理论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高度意识形态化、轻视经验证据。对新保守主义来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最终真理,而在最基本的真理面前,根本就没有客观还是不客观的事实之分。而对后现代主义来说,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本来就没有什么真实可言——一切最终只不过是‘话语’或修辞。因此,两者同样偏向理论,轻视经验(也因此使美国无视经验证据而发动伊拉克战争成为可能),并且同样地敌视马克思主义。如此的共识更促成它们之间的一种妥协,甚至联盟。”[19]63正是由于美国学术环境主要受这两种传统影响,因此它们都偏重于理论,不重视经验证据。一方面,在这样的理论传统之下,过去西方的中国研究实际上是在应用产生于西方世界的理论和逻辑来解释和分析中国,因此忽视了中国的实际;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传统所根植的西方文化土壤,对中国始终带有意识形态的审视,容易造成西方中心主义。基于这些过去中国研究方面存在的缺陷,学者需要重视实际经验,从而走向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发展的新方向,这恰恰是未来的中国研究需要在方法上的革新。总之,由于研究领域的变化,黄宗智在反思过去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突破美国原有理论传统下二元对立的框架,认识到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实际情况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西方想象性的认识,中西观念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二元的结合。

结语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并非可以分割为《近代中国》杂志的流变与黄宗智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推进及其个人的转型这两个问题①,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需要进行专门的深入讨论,这并非笔者的写作意图。本文实际上探讨的是黄宗智的学术理念、实践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即前者如何影响了刊物的走向,反过来后者又如何为前者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有影响力的平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兴起的中国学研究是区域研究的产物,也是西方学者对作为他者的中国的整体审视。黄宗智给我们的启示是:

① 关于黄宗智对自己毕生研究经验的总结以及方法论的反思与理论话语的提出,可以参见如下论文: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学术界》,2010年第3期;黄宗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国内十年教学回顾》,《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黄宗智《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黄宗智《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黄宗智《对中西方问题研究必须放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理论建设》,2016年第1期;黄宗智《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要真正从中国的论域中生成自己的理论和学术传统,同时也有必要批判性地借鉴海外中国研究的范式和经验。细读《近代中国》创办 40 多年来的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学者了解西方中国学学术史的流变与特征,而且在观点和方法上可以加强中西对话,从而架设中西文明理解与互鉴的桥梁。

参 考 文 献

[1] 刘康,李松.中国研究、后殖民主义以及身份认同——刘康访谈录[J].文艺争鸣,2018(9).

[2] 近代中国[EB/OL].[2020-12-26].https://journals.sagepub.com/description/mcx.

[3] Philip C.C.Huang.Editors'Note on Stylistic Policies[J].Modern China,1975,vol.1,no.2: 131.

[4] Philip C.C.Huang.Editor's Foreword[J].Modern China,1976,vol.2,no.2: 139-140.

[5] Philip C.C.Huang.Editor's Foreword[J].Modern China,1976,vol.2,no,4: 419-420.

[6] Philip C.C.Huang.Editor's Note[J].Modern China,1977,vol.3,no.3: 345.

[7] 李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危机:美国学界的论争及其反思[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

[8] Michael Gotz.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West: A Critical View[J].Modern China,1976,vol.2,no.3: 397-416.

[9] Alexander Woodside.History,Ideology,and Foreign Policy: A Review of Some Recent Western Works on Chinese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J].Modern China,1978,vol.4,no.2: 215-246.

[10] PHILIP C.C.HUANG.Current Research on Ming-Qing and Modern History in China[J].Modern China,1979,vol.5,no.4: 503-523.

[11] PHILIP C.C.HUANG.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J].Modern China,1991,vol.17,no.3: 299-341.

[12] PHILIP C.C.HUANG.Ideology and Theory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II[J].Modern China,1993,vol.19,no.1: 3.

[13] PHILIP C.C.HUANG.Rethink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J].Modern China,1995,vol.21,no.1: 3-7.

[14] PHILIP C.C.HUANG.Theory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our Traps and a Question[J].Modern China,1998,vol.24,no.2: 183-208.

[15] PHILIP C.C.HUANG.Beyond the Right-Left Divide: Searching for Reform from the History of Practice[J].Modern China,2010,vol.36,no.1; 115-133.

[16] Philip C.C.Huang.Our Sense of Problem: Rethinking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Modern China,2016,vol.42,no.2: 115-161.

[17] 黄宗智.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J].开放时代,2016(1).

[18] 黄宗智.对中西方问题研究必须放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J].理论建设,2016: 142.

[19] 黄宗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 ——国内十年教学回顾[J].开放时代,2012(1).

[20] Philip C.C.Huang.In Search of a Social Science Anchored in (Chinese) Realities[J].Modern China,2019,vol.45,no.1: 3-36.

[21] 黄宗智.基于中国现实的社会科学探索[J].罗雯,聂锐,编译.国外社会科学.2019(2): 152-153.

Huang Zongzhi and China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TANG Jiaman,LI Song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Cul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Modern China*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important journal of regional studies.It has been keeping pa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trend since its establishment,and has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ield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West for more than 40 years.Huang Zongzhi,a famous scholar of Chinese origin,is the founding editor and core founder of *Modern China*. His editing policy,academic idea,personalized academic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re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 theme and content of the journal,and have influenced the change of the journal's theme.In his reflection on the past China studies,he abandoned the ol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binary opposition,and pursued the new view of binary connection and binary combin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ina,which pointed o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the future China studies.

Key words: Huang Zongzhi; *Modern China*; China studies; paradigm;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　柴晋湘]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